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

SUNWU ZHENGQU DILI YANJIU

陈健梅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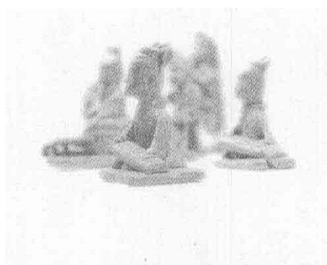
岳麓書社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

SUNWU ZHENGQU DILI YANJIU

陈健梅 著



岳麓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陈健梅著. —长沙:岳麓书社, 2008
ISBN 978-7-80665-853-6

I. 孙... II. 陈... III. ①政区—研究—中国—吴国
(222~280)②历史地理—研究—中国—吴国(222~280)
IV. K928.63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5055 号

孙吴政区地理研究

作 者:陈健梅

责任编辑:管巧灵

封面设计:刘 峰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

电话:0731—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08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75 千字

ISBN 978-7-80665-853-6/K·257

定价:30.00 元

承印:国防科技大学印刷厂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4129

序

辛德勇

当代中国的历史地理学，直接脱胎于传统的沿革地理学，而历代政区沿革和疆域变迁乃是传统沿革地理学的核心内容。长久以来，有很多从事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特别关注“历史地理学”这一词语在中国出现和使用的时间，将其视作传统的沿革地理学向近代历史地理学转变的重要标志。这样的思考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有它的合理性，但似乎也颇有其片面肤浅的一面，在此姑且置而不论，但学术界普遍强调这种词语上的差别，往往或明或暗地含有轻视甚至否定政区和疆域沿革研究的意识。持有这类看法的学者，有些人只是单纯地出自对学术发展方向的认识，以为这类研究早已过时落伍；但也有很多人，则是秉持一种别样的“见识”，即完全出自避重就轻另辟终南捷径的功利性思考。

中国历史地理学在当代的建立和发展，不仅并不意味着应当抛弃或是鄙夷传统的研究课题，而且还应当将推进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作为最基本的前提和基础。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地理

学，其所研究的对象，涉及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乃至自然环境变迁等诸多领域，其中绝大多数问题，都受到政区设置状况的严重制约甚至起着根本性的决定作用；同时，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用作最基本史料的古代地理著述，大部分也是按照历史时期的政区分区描述各项地理要素。政区设置在历史地理学学科体系当中所处的这种基础性地位，要求绝大多数历史地理学问题，都必须以政区地理作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和依托；不然的话，深入的学术研究，必然要在这方面遇到阻滞。

当前，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现实状况是，那些轻视政区地理研究的学者，往往会由于这种盲目的轻视而造成对政区地理研究状况的严重无知，再由这样的认知空虚，生成一种对前人特别是古人研究成果的盲目信从甚至崇拜，以为既往研究的水准，已经达到了今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近乎穷尽其事。实际上，即使是在清代乾嘉时期古代地理考据之学最为兴盛的时候，真正高水平的精湛研究，数量也并不多，绝大多数朝代的地理沿革问题，都需要重新全面清理，历代政区设置的基本面貌，还远远没有厘清，更永远不会终结；有些政区沿革中的重大问题，许多著名学者所承续采用的研究方法，甚至还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例如以往对秦郡的研究就是如此。

政区沿革研究对历史地理学其他诸多领域的研究具有不可或缺的基础性意义，这并不意味着较诸其他领域的研究，政区沿革是处在相对低下的层次。现在有许多人将这类具有普遍基础性意义的研究等同于价值低下的课题，一味以寻找、“开拓”新领域和新问题为能事，以为这些所谓“前沿”课题才更具有学术意义，实在是浅薄得令人齿冷。做学术研究不是排兵作战，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前沿”不“前沿”的问题；学术成果价值的大小，也并不取决于领域新不新，更重要的是做得好不好，结论真不

真，问题研究得深不深，到底够不够水平。如果一定要在一个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问题中分出高下等第，那么，在我看来，那些叠经历代学者反复探求而还没有能够得出圆满结论的问题，因为需要研究者付出更深的学术功力，具有更高超的见识，因而，或许会具有更厚重的学术分量。

强调政区沿革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的基础地位，并不是说历史时期的政区设置状况与其他地理要素之间只是单向的层级叠累关系，实际上各项地理要素之间往往是交互影响制约的。我们在今天研究以政区沿革为基本内容的政区地理问题，一方面要充分继承中国沿革地理的悠久传统和基础研究方法，同时，还要立足于现代学术的视野，努力探讨影响政区设置变化的各项地理要素，譬如自然环境、人口数量和农业开发状况、交通位置、在政治和军事地理方略格局当中所处的地位，等等。引入这些新的视角，必将大大拓展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范畴；同时，透过这些视角，也能够解决一些仅仅依靠传统方法所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深化对传统问题的研究。就中国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总体状况而言，这样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是一片充满诱惑的辽阔学术田野。

陈健梅著《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书，一方面不避艰辛，在清人钱大昕、洪亮吉、谢钟英、吴增仅、杨守敬以及近人金兆丰等众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主要沿用传统的历史考据方法，对三国孙吴的政区设置这一复杂艰涩的问题，做出了更为系统、准确的复原；同时，还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分析经济开发、交通位置等地理要素对政区设置的影响，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她的这项研究，既继承传统，严谨细致，又把握了历史政区地理研究的发展方向，在研究方法上做了比较成功的探索。遵循这样的路径，相信陈健梅会在历史政区地理的研究中取得更大的成就；也

相信会有更多的学者来从事这样的研究。

2008 年 4 月 2 日记

凡 例

一、本书探讨的是孙吴政区演变的全过程，时间上限始于东汉献帝兴平二年（195）孙策平定江东，据有会稽、丹杨、豫章、庐陵、吴郡等五郡；下限断于孙皓天纪四年（280）吴亡于晋。

二、本书于三国鼎立后的纪年采用孙吴政权纪年，引文中其他纪年补注孙吴纪年。涉及蜀汉和曹魏的事件亦采用有关当事国的纪年，补注孙吴纪年。221年（黄初二年）至222年（吴黄武元年）之间采用魏黄初纪年。除引文外，延康元年（220）一概纪以建安二十五年。

三、本书所引《三国志》原文，括号作为作者所加，目的是使上下文意思明确；中括号是承用中华书局对版本所作的校勘。

四、本书列“参考书目”，脚注不另注版本。

五、出自《三国志》裴松之注的引文，直接标注为“注引”。

六、正文出自《三国志·吴志》的引文，直接标注篇名；出自《三国志·魏志》、《三国志·蜀志》的引文分别标注为《魏志》、《蜀志》加篇名。

七、本书所引文献如没有歧义，直接采用其校勘成果，不另出注。

八、绪论和下篇所涉及的政区材料见于正文政区沿革部分的不另注出处。

九、本书于《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宋书·州郡志》、《隋书·地理志》（《五代志》）、《旧唐书·地理志》分别简称为《汉志》、《续汉志》、《宋志》、《隋志》、《旧唐志》，《元和郡县志》简称为《元和志》，《太平寰宇记》简称为《寰宇记》，《元丰九域志》简称为《九域志》，《嘉庆重修一统志》简称为《一统志》，《读史方輿纪要》简称为《方輿纪要》，《中国历史地图集》简称为《图集》。

一〇、复原图中用隶书加括号标识河流今名。

前 言

八十年代以前,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已经基本完成了通代政区地理的研究,其代表性的成果是谭其骧先生主编的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出版,同时,谭先生又在八卷本总图部分的汇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对通代政区的变迁情况作了简要的文字论述。

就历史地理学本身的发展而言,在通代政区地理研究基本完成以后,应该继续深化,转向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经陆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1987年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的出版(人民出版社)、1999年李晓杰《东汉政区地理》(山东教育出版社)以及2001年胡阿祥《六朝的疆域与政区》(西安地图出版社)的出版,代表了断代政区地理研究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其中,《西汉政区地理》基本上解决了西汉一代二百年郡国级政区的变迁过程,《东汉政区地理》梳理了东汉时期以及东汉新莽易代之际约二百年间郡国级政区的变迁过程,《六朝的疆域与政区》则从宏观上研究了六朝疆域与政区设置的特殊性。这些断代政区地理研究成果的取得,表明了孙吴政区地理研究在学术上的可行性。另一方面,断代史和专门史研究的深化也

对断代政区地理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行政区划是一个政权行政制度的基础，直接关系到许多历史事件的因果，是历史学研究不可忽视和不能回避的空间背景。从三国史的研究来看，《三国志》的研究工作已经全方位展开，并在许多领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2002年10月复旦大学古籍所主持召开的《三国志》国际学术研讨会汇集了《三国志》研究的历史学和文献学成果，而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是其中的薄弱环节。

三国时期的三个割据政权有着各自不同的自然、经济背景和政治、军事行为，面临不同的民族和疆域问题，如孙吴境内的山越问题，蜀汉境内南中的民族问题，曹魏境内北方的乌丸、鲜卑问题等。针对这些不同的问题，三个政权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政区行为，以配合政权的建设和经济的发展，本书选择其中的孙吴政区地理作为考察对象，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方面，孙吴致力于南方山区的开发，可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奠定了后世南方广大地区行政区划的基础；另一方面，孙吴在政区废置离并上因地因时制宜，充分反映了三国时期错综复杂的政治、军事因素对行政区划的影响。孙吴立国时间虽然短暂，却是政区变动频繁复杂的一个割据政权。从222年（黄武元年）曹魏封孙权为吴王，至280年（天纪四年）晋灭吴，孙吴立国江东不到六十年，如果上推到东汉兴平二年（195）孙策渡江平定江东，也还不到一百年的时间。作为立国时间短暂的割据政权，孙吴在南方的政区建置却是政区沿革史上不可逾越的阶段，计新置郡二十七（不包括毗陵典农校尉和九真、日南属国），新置县一百四十（其中扬州新置六十八县、荆州新置三十县、交州新置二十四县、广州新置十八县。不包括孙吴旋置旋废和置后人魏的县）。

孙吴政区地理的研究被涵盖在三国疆域的研究之中。三国疆域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清末民国时期，主要成果有：洪亮吉

《补三国疆域志》，谢钟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三国疆域志疑》、《三国疆域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清末杨守敬对吴增仅《三国郡县表附考证》所作的补正，民国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其他尚有零星研究成果散见于有关史注和札记中，如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卢弼《三国志集解》、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等，这些研究成果尚有待全面系统地收集整理。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关于孙吴政区部分是以262年（吴永安五年）的政区设置编绘的，同时通过注记方式反映出孙吴疆域政区变迁的大势。其州郡县建置则据吴增仅《三国郡县表》，参谢钟英《三国疆域表》、洪亮吉《补三国疆域志》绘出，基本上反映了清人研究成果。

综观前人对三国疆域的研究，虽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尚有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继承和批判，三国疆域的研究不断取得新的进展。吴增仅肯定《洪志》广搜各种史籍以及有关类书、地志、图经等，批判其断限不严，不合补地理志的体例。此外，他还指出，《洪志》“据《郡国志》、《晋志》等书，弥缝离合，至具苦心，惟所列州、郡、县、道，未尽求合史文”（《〈三国郡县表附考证〉序》）。杨守敬更直言洪氏“揣度出之，而于本书纪传且多不照。沧州叶圭绶谓洪氏之书想当然耳，非过论也”（《〈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补正〉记》）。谢钟英自言其《补三国疆域志补注》、《三国疆域志疑》对《洪志》“审其是非，正其缺误”，《三国疆域表》于“百年之内，疆场无常，区分国土，先严断限，今惟以最后为断”（《〈补三国疆域志补注〉凡例》）。然则《三国疆域表》是对孙吴末年政区状况的静态还原，其特色是标注了郡级政区的辖境和县级政区治所的相对位置。谢表较之《洪志》已胜过许多，然杨守敬认为其“沿讹者亦不少”（《〈三国郡县表附考证补正〉记》）。较之

《洪志》、谢表，吴增仅《三国郡县表》更为精密细致。杨守敬充分肯定吴氏“稽合史文，改志为表，求诸史文而不得，然后旁及后世地志诸书。又以本朝舆图证以先辈释地，识其方域，正其舛误，托始于献帝初年，溯源于后汉郡国，三姓世系以次相承。凡州郡离合之故，县邑沿革之由，各因其时，著之于表”（同上）。然《吴表》“间有遗漏，或舍古志而据方书”，杨氏对此一一补正。杨氏还“钩稽三国时郡县故址，十得八九……据最后之馆籍图之”，绘成《三国疆域图》（《历代舆地图》之一种）。金兆丰《校补三国疆域志》“补洪氏之阙遗及纠其谬而绳其误者，盖十之四五焉。……较（洪、谢）两家之所校补，尤博且精”（王树楠《〈校补三国疆域志〉序》）。然金志也存在断代不严的问题。本书通过对清人研究成果的综合分析和批评，肯定其正确的，补充其不足的，纠正其错误的，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力求使孙吴政区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书从郡县沿革的考证和县级政区治所位置的复原两方面完成对孙吴政区地理研究的基础部分，力求复原孙吴政区的概貌，并揭示其演变过程。

郡县沿革的考证以孙皓末年郡级政区为基准，分三个时间剖面对各郡属县进行考证：见于《续汉书·郡国志》的旧县、汉末汉政权所置县（书中称为“汉末所置县”）、孙吴所置县（包括后汉兴平、建安年间）。孙吴时一度置废的郡作废郡处理，并考证其辖县的具体变迁情况。郡县之外，本书尽量钩沉出孙吴基层政区如乡、村、里、亭的存在情况，一方面借此反映出当时的人文风貌，一方面也为南北朝时期政区的沿革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原始线索。这项工作的进行以基层政区具有相对稳定性和一定继承性为前提，凡孙吴以前即已存在，仍见于孙吴以后地志资料的乡、村，推定为孙吴亦有；凡南北朝时期分置为县的乡，推定为

孙吴时即有。

对于孙吴政区郡县沿革的考证和处理需要解决两个问题。其一是文献问题。“三国无志，事出帝纪，虽立郡时见，而置县不书。”（《宋书·州郡志》序）因此，对孙吴政区郡县沿革的研究只能前后分别参照后汉和西晋。然《续汉书·地理志》于安、顺后所置郡县即不复载，刘昭注所涉及的亦有限。西晋虽然立国短暂，然太康元年（280）于原三国包括孙吴疆域内的政区，尤其是县级政区的变动较大，或更名，或置废，因此对《晋太康地记》的参照必须慎重。鉴于韦昭曾领吴左国史、杜预曾为平吴镇南将军，本书对韦昭《国语注》、杜预《左传集解》关于孙吴疆域内的史地材料作为孙吴政区的第一手资料予以采用。关于孙吴政区建置沿革的线索更多地需要从唐宋地志以及有关类书中钩沉，并配合相关历史事件予以推定。其二是时间截面的问题。本书对郡级政区的划分以孙皓末年为基准，孙吴时一度置废的郡作废郡处理，并考证其辖县的具体变迁情况。对各郡属县的考证分三个时间剖面：见于《续汉志》的汉旧县、汉末汉政权所置县、孙吴所置县（包括后汉兴平、建安年间）。

对于孙吴县级政区治所位置的复原存在相当的困难，主要是资料缺乏，所谓“文献不足征”。谢钟英《三国疆域表》对于三国县治有简略的考察，然不足依据。《宋志》述及孙吴政区的沿革较多，然不及治所变迁。因此，县级政区治所位置的复原主要利用《水经注》的水系系统以及唐宋以后地志关于县治治所迁徙情况的记载。因为地质地貌原因，南方河流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利用水系复原治所位置本应是比较精确可靠的方法，然《水经注》于南方水系的记载比较混乱，资料的利用有一定难度。虽然，《水经注》仍是目前可资参考的重要原始文献，本书结合唐宋地志，充分利用了《水经注》在县治复原中的资料价

值。唐宋以后的地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县级政区治所位置的迁徙，然于隋平陈以前政区的治所位置多以汉为基点，保留了汉县故城遗址的资料。考虑到孙吴立国时间短暂，又为三国鼎立的多事之秋，广大的南方地区处于筚路蓝缕的开发之中，加之短暂的历史时期中自然因素对于治所位置的影响存在着极小的偶然性，本书对孙吴疆域内汉旧县治所位置的复原推定为对汉县治所一定程度的继承，即对于六朝前未见迁徙记载的县治，默认为孙吴仍汉旧治，其中具体而微的工作尚有待于考古工作地下资料的进一步发掘和证明。对于难以考订的县治阙疑，以俟后贤。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本书对孙吴县级政区治所的复原只能以文献为基础，其相对位置大多以清代县治为参照，鉴于清代治所的可考性，孙吴县治亦大致可定。本书于各郡辖境的描述同郡级政区的划分，即以孙皓末年为基准。所附各郡复原图为其所辖全部包括一度置废的县级政区治所位置示意图，目的是为了标识县级政区治所的相对位置，以直观反映文字考证的结果，不代表任一时间截面上的政区建置，具体置废沿革在书中说明，郡治则标识吴末治所。

绪论和下篇是对孙吴政区沿革的补充研究，其涉及内容应该涵盖在孙吴政区地理的研究之中。其中绪论部分叙述了孙吴疆域的经略过程和政区建置的概况，探讨了孙吴特殊政区制度和边境区的几个问题。下篇在政区复原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孙吴政区废置离并的规律及其特定的历史地理要素，如鼎立格局的变化、民族问题、地区开发、交通路线等，揭示其政区行为和历史背景、经济、军事以及自然环境等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孙吴以前的中央王朝在南方地区的经营主要是开疆拓土，而对南方进行编户齐民的经济开发和政区建设则始自孙吴。孙吴筚路蓝缕的开发之功为隋唐以后南方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奠定了政治、经济基础，本书

对孙吴政区的复原和研究同时也展示了这一割据政权对南方山林逐渐开发的历史过程。

本书在考证和分析中充分利用了史部典籍，包括正史、类书、地理总志、方志以及史注、史评等，并涉及了一些经部和子部的文献。因受到文献、地理诸方面的限制，本书对孙吴交州的考证比较粗略，尤其是县级政区治所位置大多阙疑，详细精确的工作有待文献的进一步挖掘和对地理语境的充分把握。

目 录

序	(1)
凡例	(1)
前言	(1)
绪论	(1)
第一节 孙吴疆域的经略与政区建置概述	(1)
第二节 孙吴特殊政区制度	(11)
第三节 有关孙吴边境区的几个问题	(20)

上篇 孙吴政区建置沿革

第一章 扬州	(33)
第一节 庐江郡	(35)
第二节 蕲春郡	(39)
第三节 丹杨郡	(43)
第四节 新都郡	(59)
第五节 吴郡	(63)
第六节 毗陵典农校尉	(72)
第七节 吴兴郡	(74)
第八节 会稽郡	(81)
第九节 东阳郡	(88)